

近代西方文献中的宁波

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间谍船在宁波(六)

田力

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初到宁波的时候，林赛对在这里交易抱有很大希望，他说“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在这个地方处理大部分的货物”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发现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拦，这个希望很有可能要落空。

1832年6月7日，刚返回宁波的宁绍台道方传穰就命手下的一位陆姓家仆送来文书，要求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不得再逗留宁波。这份《宁绍台道谕胡夏米书》，是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自本年2月26日从澳门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以来，收到的第一份正式的官府论文。虽然文中拒绝林赛在宁波贸易，但林赛认为这份文书“不同寻常而且非常有趣”，因为“即使是在中国皇帝致英国国王的信中，‘夷’（野蛮人）这一充满攻击性的和极度无礼的用词也毫无例外会被使用”，而这是“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在行文中将‘夷’字完全省略，而代之以‘远人’（yuen-jin）”的官方文书。他将这一变化“部分地归因于之前与提督的谈话和与见到的各级官员（特别是马大老爷）有关这个问题的经常性讨论”。林赛还通过此事发现，实际上“不存在任何规章制度禁止中国政府官员与外国人直接进行对话，而此事在广州总是被拒绝，呈送给官员的禀文，仅仅是通过行商来转递”。

方传穰的论文先是重申自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起，贸易口岸定在广东，不得再赴浙港，并举例说在1759年，英商洪仁辉（James Flink）等人来浙要求贸易，宁波官府谕知“业奉奏定广东，断难在浙成交”，于是洪仁辉“遵即开行赴广，径未敢故违禁约也”。其实，洪仁辉压根就没有南下广东，而是在舟山挂帆北上，一直到达天津大沽，要向乾隆皇帝告御状。不知方道台是不了解这段史实，还是故意对林赛等人隐瞒不说。论文最后以不留余地的口吻告知林赛：“谕到，该商当知我天朝法律森严，守土官惟知奉大皇帝旨，不能违禁开例。况宁波向无开设洋行商牙，亦不敢擅与交易；倘有奸徒串诱，断勿轻信其言，致与尔等有损无益。即速听劝开行，不可再事迟滞。我文武先后婉言开导者，无非仰体大皇帝怀柔远人之至意也。此谕。”

直到此时，林赛才察觉之前负责与其交涉的中方官员让他看到的贸易希望，比如马大老爷介绍福建商人来船上看货，只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罢了。于是，林赛告诉送论文的道台仆人“陆老爷”（Lo Leao-yay），“此前我们一直受到诱导，认为会得到官府的默许。所以现在，我们一旦卖掉了货物，马上就会离开；否则，我们的离开就很不确定了。”林赛此言让陆老爷感到非常失望，他声称浙江提督戴雄甚至因为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的到来而忧虑成疾，看到林赛无动于衷，他跪到地上就要磕头，被林赛一把拉住。陆老爷还暗示，只要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能够离开宁



舟山港口。这幅水彩画是由鸦片战争期间英军随军医生克里（Edward H. Cree）所绘，原存于其私人日记中。画面下方的英文意为：1840年8月8日，在Trumbull岛眺望舟山港。Trumbull岛是英国人以1700年来舟山贸易的英国商船的船名来命名的。

波，中国官员情愿送上一笔钱财作为礼物，但此提议遭到林赛拒绝。

陆老爷走后，林赛对目前的处境进行了一番分析，鉴于宁波官方的坚决态度，想在这里交易已不太可能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需要赶紧将在中国沿海搜集到的消息传递回澳门，不能一直在宁波耽搁下去。于是林赛决定离开，他写下一封禀文，题为《胡夏米上宁绍台道书》，作为对方道台论文的回文，全文如下：

英吉利国船主胡夏米禀宁绍台兵备道大人。现在受谕，令远客沾感无尽。盖谕的礼言，满中心意，所以远客带回奉我大英国官员。况且远客至宁波府城之时，受正堂大老爷并文武官厚待，是以感激靡涯。我英国人虽今年不准进口买卖，但仰望明年至此，贵国大皇上准商等照例贸易，那时将见我国的人甘心禀遵公道的法度，并常守相安焉。先应验相约就开行，不应验相约不开行而已矣。胡夏米船主请陆老爷递此字奉尊武官而读之。

道台大人收到禀文后很高兴，赶紧趁热打铁，再次派人送来批文，要求林赛等人速速离开宁波，文中提到“该商既知宁波不允进口买卖，所谕盖是礼言，应即开船前赴广东，照常贸易，诚为官商两便之举，切勿再延。以后总要恭奉大皇帝旨意，知照尔英国，由国王传谕等商人一体遵禀。不奉旨，万不能行。所谓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彼此皆不得擅自主张也”。林赛阅读该文后的感受是“它的整个基调都是特别温和与谦逊的”，尤其是道台承诺会将整个事件报告给皇帝做决定，林赛表示“我不得不说这是非常令人满意的”。

宁波官方一方面对林赛等人好言相劝，让其离开；同时又在甬江上设置障碍，对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进行防堵。林赛观察到“在整个10号的早晨，中国人的战船上都非常忙碌。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，我们看到他们从岸上运来许多大圆木，并用粗绳将每一根圆木固定在两船之间。在他们的设想中，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封锁甬江。在两艘最大的战船中间，他们搭了一条可移动

的木筏，可以用绳索随意拉动它”。不过在他看来“向我们展示军事防御的目的是为了在精神上震慑我们，让我们通知己方的朋友们，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令人生畏的防御工事，以阻止他们的接近。这个想法其实是值得怀疑的，但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是他们的意图。然而其效果却大不相同，仅仅表明他们无力对欧洲最小规模的军队进行有效抵抗”。

中国水师官兵组建的这道江上封锁线确实无法阻挡英国人的活动。“下午，礼士船长坐大艇出去查看中国战船的防卫情况，当他靠近时，大量的战船迎了上来，示意他不要前进，但没有一艘尽力去拦截他，于是他在两艘大船之间笔直地穿行过去。虽然大船上的人们竭力拉起竹筏想挡住他的去路，但这已经太迟了，反倒是将一些紧跟在礼士船长后面的那些中国船给困住了”。

6月11日，林赛、郭实猎和马大老爷等官员在镇海的一座庙宇中再次会晤。中方官员提出各种办法，诱使英国人尽快离开宁波。林赛写道：

我非常惊讶地听到，马大老爷在其他一些官员（其中有位还是抚院大人派来的）面前公开地向我保证，如果我们能驶离宁波到远一点的地方，大人们就会乐得视而不见，而我们可以自由交易了。他强烈建议我们去上海，还高度赞扬了那个地方的富有。如果外国商船到宁波做买卖是非法的，那在上海也是同样的啊。对这种明显不一致的解释是，上海位于别的省，因此他们对于我们的到访会给当地的官员们造成什么样的麻烦，也就无所谓了。……马大老爷还说，大人们急于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我们因延误而蒙受的损失，因此希望馈赠我们600银元。……我告诉马，请他代我向其上司转达谢意，感谢他们的慷慨解囊。但是，即使是最小的一件礼物，我也不能接受。马听了我的顾虑后显得很惊讶，询问我原因。我回复道：“如果我国的商船在这里就如同乞丐一样接受施舍，这将会有损国家的名誉。”

林赛认为“再耽搁下去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了”，于是通知马

大老爷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即将离开宁波港，又请中方代为购买一些补给。宁波官员得知这一“喜讯”，均欢欣不已。6月12日一大早，就备齐了林赛所列清单上的东西。镇海知县郭淳章命人送来水果等礼物，林赛予以回礼，“一段蓝色羽纱布、一段紫色平纹细布、一打甜酒和六罐利口酒”，对方原本不愿接受，但在其坚持之下，最后还是妥协了。6月13日，定海镇总兵陈步云又送来礼物，林赛依然坚持回礼。他讲述了离开宁波前与官员们道别的情况：“这些天来与我们友好相处的所有官员都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礼物，我们在离别时，都表达了彼此的善意。我方表示，希望来年再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在宁波建立贸易的每一件事情都已谈妥，而官员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说，他们所期待的与我们的完全一致。”其实，不论林赛这个时候说什么，宁波的官员们都会点头称是。当天中午，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终于离开甬江，但并没有驶出浙江海域，而是到了金塘岛，在这里一直逗留到6月16日。在此期间，林赛等人除了出售货物外，还向民众分发各种小册子，测量周边的海域和岛屿，绘制地图。此后，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又前往上海、山东沿海以及朝鲜，后经琉球返回广东。9月5日，抵达澳门，完成了这次长达半年的探查航行。

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在宁波的二十多天究竟获得了什么呢？林赛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写道：“如果日后英国舰队司令带着他的部队到中国（此事我们在离开时就完全有理由期待会发生），那么我们一路上获取的有关中国海岸地区的知识，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，对当地政府极度虚弱和愚蠢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的了解，将会被证明非常有用。”也就是说，他们为日后英国军队入侵中国搜集到了更为可靠的情报。

1835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水文测量师霍斯伯格（James Horsburgh）依据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在华非法勘测活动所获取的数据制作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新海图，这样的工作为英国对华经济、军事冲击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。也是在同一年，林赛根据此次侦查的结果，致信英国外交大臣帕斯顿，提出武力侵华的建议，而他的建议又成为1839年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。看来，当年宁波的官员说“阿美士德勋爵号”是英国军队侵略中国的先锋，倒颇有些先见之明。



NINGBO ARCHIVES
宁波档案